

现代新儒学 研究论集

(一)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

(一)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4月

责任编辑：郭齐勇 李维武

责任校对：徐培英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

Xiandai Xinruxue Yanjiu Lunji

(一)

方克立 李锦全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考 告 应 经 销

太 阳 宫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87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04-0444-1/B·79 定价：4.70元

出版说明

随着文化讨论的深入开展，现代新儒学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和普遍重视。这是因为，现代新儒学是在传统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和哲学思潮，它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所作出的抉择，在今天仍有重新进行批判地审视和清理、总结、借鉴的必要。尤其是这一思潮还不是完全过去的历史，它今天仍然活跃在港台和海外，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不仅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而且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被确定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1987年9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一批热爱祖国历史文化、关心人类的前途命运、学有根柢、富有探索精神的中青年学者积极地投入了这项研究工作。他们拿出的第一批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就是奉献于读者面前的本论集的各篇论文。它们可能还不十分成熟和完善，各篇论文所取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理论观点甚至情感态度也不尽一致，但都是诚实劳动和大胆探索的结果，各有新意，富于启发性，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以推动对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学术讨论。

1988年5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国内第一本对“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论文汇集。现代新儒学是在传统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和哲学思潮，它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所作的回答，在今天仍有重新审视和清理的必要。书中选入论文18篇，附录2篇。各篇论文所取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理论观点等不尽相同，但是资料充实、各有新意则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目 录

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方克立(1)	
谈谈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和	
方法·····金隆德(14)	
论当代新儒家的历程和地位·····罗义俊(26)	
试论新儒学的演变·····颜炳罡(51)	
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郑家栋(70)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	
现代新儒家·····滕复(85)	
儒学的现代走向	
——读现代新儒家有关论著札记·····蒋国保(105)	
援西学入儒的尝试·····宋志明(128)	
现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学本体论	
的重建·····黎振国(143)	
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初探·····李维武(158)	
新儒学与美国的儒学研究·····施忠连(180)	
梁漱溟“新王学”述评·····朱义禄(197)	
张君勱新儒学思想初探·····吕希晨 陈莹(212)	
冯友兰“共相说”钩沉·····田文军(235)	
冯友兰伦理哲学简论·····赵德志(253)	
唐君毅的文化心态及其中国文化观···李宗桂(266)	
“弘大而辟，深闳而肆”	
——唐君毅中西文化观述要·····冷德熙(283)	
简论牟宗三的中西文化比较模式···郭齐勇(304)	

〔附 录〕

-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来
和宣州会议的争鸣…………… 李宗桂(332)
- 现代新儒学研究(1986—1987)
- 综述…………… 韩 强(341)

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

方克立

一年来，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见诸报刊的论文不下十数篇，各种不同观点都摆了出来。“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已有十多个省市的近五十名学者积极地投入了这项研究工作。今年九月，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围绕着现代新儒家的定义（对象、范围）、产生背景、阶段划分、理论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有幸参加并和李锦全教授共同主持这一课题研究，这里，我想就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结合讨论中的各种意见，谈点我个人的看法。

一 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这项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我们无意于也没有能力给“现代新儒家”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完善而准确的定义。但是，它首先涉及到研究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事实上由于对现代新儒家的概念和标准的理解不同，人们对哪些人是现代新儒家、哪些人不是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熊十力、梁漱溟、冯友

• 本文是作者1987年12月28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兰、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最典型的代表^①，有的学者则选择了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四人作为主要论述对象^②；有的学者认为方东美不是新儒家^③，还有的学者认为说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是现代新儒家是“不妥当”的^④。有的文章论述现代新儒学的演变，上溯到康有为、梁启超企图把封建儒学转换成资产阶级儒学的尝试；有的文章则把现代新儒家的上限明确地界定为“五四”以后，论述了它在六十多年历史演进中的三个发展阶段；还有的文章着重评介了以余英时、杜维明为代表的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思想^⑤。总之，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定义、标准、范围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有的甚至大相径庭。不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作为一个统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至少在我们课题组内应该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意见。

经过讨论，我们得到了初步的共识，即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根据这一认识，我们在界定现代新儒家时，不能不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学脉传承来说，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儒家，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基本特征。他们有感于儒学在近代的衰落，怀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的使命感，力图上承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重建儒家的价值

① 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文化：中国与世界》第3期。

② 刘述先：《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传习录》第5期。

③ 陈鼓应先生持这种观点。

④ 张岱年：《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理论月刊》1987年第1期。

⑤ 何新：《对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评海外新儒学》，《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2期。

系统，使儒学在当今得到“第三期之发扬”。所谓“第三期”是针对“第一期”（先秦儒学）和“第二期”（宋明新儒学）而言的，即是指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儒学发展三期论正是其道统观念之最明显的写照。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致思趋向和哲学观念上也表现出千差万别，但在尊孔崇儒、以儒家圣贤自命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这正是决定其为现代中国的儒家而不是墨家、道家或其他什么“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 尊崇宋明理学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精神取向。他们所理解的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实就是宋明理学的精神，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大流，强调以“内圣”驭“外王”，通过提高道德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现代新儒家的主流派（从熊十力到牟宗三）似乎是更重视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一派，但却不能以是否推重陆王心学为绝对标准；冯友兰的新理学就是“接着”程朱讲的，方东美也更推重程朱理学，不能否认他们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有的学者如熊十力，曾宣称“余平生于宋学无甚好感”^①，但是他极力阐扬、绍述的“尽己性以尽物性”的“圣学血脉”^②，正是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根本精神。现代新儒学和宋明理学（新儒学）之同一个“新”字，一是指它们皆非简单地复归先秦儒学，而是表现了能够融合佛道以至会通西学的开放性，二是指它们都特重儒家“内圣”之学，不离“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思想格局。

（三） 从时代特征来看，现代新儒家区别于先秦儒家亦区别于宋明新儒家，它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迫切的现代化问题，其对应现实的方法是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力图找到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道路。它一方面认同传统文化，一方面迎接西方新潮以适应时代需

① 熊十力：《乾坤衍》，1961年自印本，下册第58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壬辰本，癸巳赘语。

要。港台新儒家提出了“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近代哲学和文化的影响，“援西学入儒”、“儒化（华化）西洋文化”是他们共同致力的工作，而且后来者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四）从时间界限来说，我们认为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它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力图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这个时间界限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是一致的，所以叫“现代新儒家”可能比称“当代新儒家”更恰当一些^①。我们在考虑现代新儒家产生的文化背景时，自然不能忽略他们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但康、梁在戊戌以后的保守思想却不能归入现代新儒家的范畴，辛亥前后的国粹派同它也有显著的思想特征的差异。至于下限，谁也不能否认，现代新儒家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活着的思想派别。恐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之前，不仅“全盘西化”论总会有一定市场，希望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也总会有人欣赏。

（五）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有的学者认为钱穆是史学家，徐复观是思想史家，张君勱是政治家，都不能算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是把现代新儒家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思潮，甚至以是否重视终极关怀、安身立命问题为主要选择标准。我们认为这样理解就太狭窄了。例如，钱穆先生虽然是一个史学家，但是他首先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为一活的生命，这就是儒家的精神；他极其推崇宋明理学，以宋明理学为指导思想来

^① “当代”一般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海外称“当代新儒家”，虽然也提到梁漱溟、熊十力等前期代表人物，但主要是突出五十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家的地位。

编纂历史，同时又以叙述历史的方式来阐发宋明理学的基本思想。他无疑是广义的现代新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把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潮”来研究，似乎很难越过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前代表人物；研究他们前期的新儒家思想，并不等于对其一生学术活动作结论，也不否定他们后来学术思想的转变和进步。

正是根据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的上述理解，我们课题组初步确定以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十人为重点研究对象。他们基本上属于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有的则是跨两代的人物（如张君勱、钱穆等）。1976年在傅乐诗编的《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一书中提到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82年在台湾《中国论坛》召开的“当代新儒家和中国现代化”座谈会上所提到的代表人物，大体上均不出此范围。至于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大都活跃在当今港台和海外学术思想界，他们的思想表现出更多新的特点，并且正在发展变化中，研究他们可能更饶有兴味和更富现实意义，但只能俟诸来日。

二 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新儒家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潮，而且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但是必须肯定，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其实尊崇宋明理学就是一种哲学倾向，也是一种哲学观点。他们中不少人都有重要的哲学创造，自成体系，堪称大家；加上他们在哲学路线、倾向上的共同性，以及相互之间表现出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使这派哲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的中国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作为社会政治、经济

变动的反映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通常把中国近现代思想概括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流派。激进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通常提到的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自由主义是指以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则被归属于保守主义，并且提出一个新名词，叫做“文化的保守主义”，以区别于所谓“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除了现代新儒家之外，还包括孔教派、国粹派以至国民党戴季陶、陈立夫的哲学。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从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尽管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线”还有争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索和总结，但是，经过七十年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其强大的政治优势和最终胜利而占据了现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一事实，却是有目共睹、谁也否认不了的。只有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课题的哲学，才能够称得上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近现代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都先后传入中国，其中主要有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等。对于这些流派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地位 and 作用，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其中有的确如过眼烟云，稍现即逝，其影响所及，始终没有超出几所大学的讲坛。有的被现代新儒家学者吸收和改造，成为他们铸造自己的中西合璧的哲学体系的要素和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实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严复、胡适到金岳霖，似乎可以找到一条前后可循的线索，他们在研究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改变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

是，从总体上来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西学”，上述思想流派的力量、作用和影响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没能创造出自己的真正独立的哲学”^①，我们不能把它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

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的保皇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本位文化派、戴季陶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等，不但政治上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十分明显，而且在理论上也谈不上有什么重要创造，因而在学术界的影响是很小的。

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潮流中，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比较具有继往开来意义、在理论上有一定创造性、影响较大而且生命力较长久的，唯有现代新儒家。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其原因恐怕在于它比西化派和顽固守旧派都更好地解决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任何植根深厚并能有效地发挥其现实功能的哲学，都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全盘西化”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把传统推进到现代，使之有创造性的转换，那么它就只能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包袱。从维护儒家传统、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意义来说，现代新儒家属于保守主义的传统派；但是它又并不绝对排拒西学，而是主张在认同儒学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哲学和文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新儒家又不同于孔教会、国粹派等其他保守主义的派别。它在本质上属于中体西用派，比较各执一端的西化派和顽固守旧派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因而其影响和作用也是这些派别所不可比拟的。

有的同志提出了现代新儒家哲学是“五四以后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主线或主干”的命题，认为：“五四以来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并不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麻，而是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的，这条主线就是‘新儒家’哲学”；“如果把五四以来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比作一棵大树，其他流派好比枝叉，‘新儒家’哲

^① 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

学才是主干”^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早在四十多年前，贺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曾经写道：“根据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势的观察，我敢断言，广义的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②主线论或主潮论可能渊源于此。贺麟先生当时是站在现代新儒家的立场，在观察、总结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时，有意忽视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威力和影响；但是这一概括和总结，如果仅就五四以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来说，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主线或主潮，还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贺先生作为一个通晓西方哲学、努力译介黑格尔和新黑格尔主义的学者，他看到了，任何西方传人的思想学说，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就不可能在中国扎根，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和发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力图把新黑格尔主义和陆王心学结合起来，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还系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新儒家思潮的发展状况和理论得失，确立了它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潮”的地位。如能排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用这种观点去清理中国现代哲学史，是有可能把脉络搞得更清楚一些的。当然，作为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学者，贺先生早已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不能否认他在四十年前的论断仍包含着部分的真理。

明确现代新儒家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主线或主潮的地位，对于深入开展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可以改变过去那种把五四以后的地主资产阶级哲学一概看成是腐朽的没落的，把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一概说成是反动的简单僵化观念；它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更注意那些融合中西、富有中国特色因而也更具有世界意义的独创性的哲学体系，更注意我们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哲学创造和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思想战线的复杂

① 宋志明博士论文：《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哲学思想研究》，油印本。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

情况，了解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预计今后的发展趋势，以便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针。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思潮在今天还不能算是完全过去的历史，它还活着，还在发展，我们对它进行历史性的研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关于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一上马，就碰到了为什么要开展这项研究和怎样开展研究的问题，前者在“课题论证”中初步解决后，研究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便突出了起来。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在研究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老实实在地从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工作做起。

起初，曾有同志提出，这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目前人们对什么是现代新儒家，有哪些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观点，其产生背景、发展阶段和今后趋势如何等均不甚了了，如能组织一个精干的班子，分工合作，两三年内就能写出一本《现代新儒学概论》或《现代新儒家思潮史》之类的专著来。我们认为，这不失为一条早出成果、早见效益的“捷径”，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基础很差，没有扎实的资料准备，没有一批专人专题的局部研究成果做基础，要写出真正有科学性的“概论”或“思潮史”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对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前期代表人物，近年来才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还没有拿出系统的研究成果来；而对五十年代以后在港台大力宣传新儒学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大陆学界因多年隔绝，知之甚少，近年来进口了一批台港版图书，对他们始有所知，但掌握的资料仍很不完全。因此，我们的工作必须从最基础的资料收集整理做起，按照统一计划，分工协作，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分别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包括必要的调查访问，编写传记、年谱等，通过“知人论世”进而研究思想学说，

写出专人专题研究的系列论著来，在局部、微观研究基础上，然后才有可能宏观地把握整个思潮和弄清一些更深刻的本质问题。我们期以十年，通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扎实工作，将陆续推出《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家学案》等成果来，为后来者更高层次的研究打下一点基础。

（二）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

对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分析和评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有批评的态度，也有赞赏的态度或同情地了解的态度。在批评的态度中，有站在西化派立场的批评，有站在更保守的国粹派立场的批评，也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力求客观、实事求是的批评。提倡哲学史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多途径，并不意味着肯定真理多元论，而是力图把握真理的全面性。过去那种简单僵化的哲学史研究模式，是不符合真理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的要求的，也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神。

要正确揭示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实质、产生根源、社会作用和发展前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离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不行的。因为它确实是在阶级社会和复杂的阶级斗争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文化现象，相信它宣传的抽象人性、超越的道德本体、不变的“历史文化精神”等等是幼稚的。我们还是要将现代新儒家放到中国现代社会和思想斗争中来考察，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来了解它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主张，肯定其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理论创造，合理的思想成分，批评其错误和保守落后的方面。对于它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道统论、高扬道德理性的伦理本位主义，以及攻击“五四”运动、反对马列主义、诋毁大陆中共的政策、鼓吹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等等，我们当然不能肯定，而是必须加以批评。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对于现代新儒家和其他有成就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只能捧而不能批评，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左”和“僵化”。